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孙逊 主编

孙虎堂 著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现在看来，在三地汉文小说中，日本汉文小说在数量上不及韩国、越南汉文小说丰厚，学者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较薄弱。据目前所知，最先关注它们的是日本本国学者，他们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且持续至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开拓者当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他在1987-1988年间在日本天理大学讲学的时候，通过多种渠道约请得奈良、平安、江戸、明治各个历史时期的汉文小说作品数十种，从1988年起，王三庆又与台湾中正大学庄稚州教授、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陈庆浩教授等人，共同主持了“中日法合作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计划”，他们在日本筑波大学内山知也教授的协助下，又搜集得小说数十种，连同以前所获得的作品，共收得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近70种。之后数年，由王三庆、庄稚州、陈庆浩、内山知也四位教授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总刊》第一辑于2003年10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这辑丛书共五辑，收录了《猿蓑漫稿》等6部（篇）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考订、校注均达到了一定水平，富含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另外，王三庆等人又开列多种待收书目，并拟继续加强对作品的访求、整理和出版工作。在大陆学界，以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为代表，学者们也逐渐对三地汉文小说展开了整理和研究。例如，孙逊教授曾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李时人教授主持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影响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近年来，孙逊教授又依托上海师范大学、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与法国陈庆浩、台湾王三庆、陈益源、王国良诸教授联手，合作推出了包括东亚汉文小说和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在内的《海外汉文小说全集》出版计划，预计未来数年内即将陆续结出硕果。自然，在上述两种旨在加强域外汉文小说整理和研究学术活动中，日本汉文小说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孙逊教授为代表的几名大陆学者通过单篇文章、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孙虎堂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1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5660-1

I. ①日... II. ①孙... III. ①汉语—小说—文学研究—日本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8766 号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孙虎堂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660-1

I · 2230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 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学术领域

（代序）

孙 逊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创作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前者主要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后者主要为欧美等国传教士。国内学术界习惯将其统称为“域外汉文作品”或“海外汉文作品”。

在海外汉文作品中，汉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其中，东亚地区原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双重历史身份，其创作的汉文小说不仅都是用汉字写成，而且它们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大都遵循儒家思想而展开，这种“大同”现象在东亚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到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和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汉文小说也真实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而产生的“小异”乃至背离。全面研究其“大同”和“小异”，或曰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我们不仅可以具体感受到中国和东亚各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相通之处，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文学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同特点。

在海外汉文小说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著汉文小说是另外一个块面。按理，这些传教士信奉的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接受和宣传的是西方宗教和文明，但由于他们撰写汉文小说大都是为传教服务，为了使中国信徒和受众能更好地接受他们宣传的西方教义，他们往往

也要找到西方宗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集合点,其中与儒、佛、道思想的相互交融就渗透在他们作品的肌理之中,而小说的形式则为他们提供了传教的一种理想文体形式。要想了解西方来华传教士如何借用小说这一形式,并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契合来宣传西方宗教思想,这些传教士汉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范本。

海外汉文小说就其作家作品的国家属性来说,首先应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则是传教士所属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中不少还是所在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有关外国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因而它们又理所当然的是汉文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它们之间和我国古代小说的亲缘关系,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海外汉文小说这一块,那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也是不完备的。

不仅如此,正因为上述汉文小说和我国古代小说有着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其中大量作品都是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代小说直接影响下创作的,因而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文学中最具实证意义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主编了这套“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首先推出《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韩国汉文小说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和《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共四本,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还会有新的著作汇入丛书之内。于此同时,我们还正在主编“海外汉文小说大系”,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10年年内可望出版,其他韩国、日本部分再稍待时日;如果可能,最后再将西方来华传教士部分汇入。

由于搜集资料不易,对各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之较少,加上撰写者水平有限并参差不齐,本丛书肯定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诚恳地请求大家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理路	1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评述	1
二、本书的研究理路	7
第二节 日本汉文小说及其历史文化语境概述	17
一、中日文化传播语境中的日本汉文学	
——以汉籍东传与汉诗文创作为中心	17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入与日本汉文小说的历史轨迹	28
第二章 笔记体日本汉文小说	42
第一节 轶事类小说：《大东世语》与《谭海》	44
一、日本版《世说新语》：《大东世语》	44
二、为近世吉士佳人立传：《谭海》	54
【附】同为吉士佳人立传的《淞北夜谭》	63
第二节 谐谈类小说：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的汉文	
笑话集	66
一、中国古代笑话集的传入与影响	67
二、中国古代笑话的翻译与日本汉文笑话的发生	72
三、《译准开口新语》等六部日本汉文笑话集	78
第三节 艳情小说《大东闺语》与花柳风俗小说《柳桥新志》	96
一、风雅蕴藉载东瀛艳情：《大东闺语》	96

二、花街名姝寄兴衰之叹：《柳桥新志》	108
第四节 异闻类小说：《啜茗谈柄》、《贤乎己》与 《当世新话》	115
一、乡间异闻：《啜茗谈柄》	115
二、读书漫记：《贤乎己》	119
三、源自新闻：《当世新话》	121
第三章 传奇体日本汉文小说	125
第一节 民间传说类小说：《浦岛子传》与《续浦岛子 传记》	125
【附】关于《日本七福神传》	134
第二节 世情类小说：《阿姑麻传》	136
第三节 民间故事类小说：《含饴纪事》与《昔昔春秋》	142
一、熊阪台州的《含饴纪事》	142
二、中井履轩的《昔昔春秋》	150
第四节 艳情类小说：《枕藏史》	156
第五节 “虞初体”日本汉文小说集	167
一、《虞初新志》在日本的流布与影响	168
二、编选他人作品：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	170
三、编选本人作品：菊池纯的《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	172
四、其他“虞初体”汉文小说集：《奇文欣赏》与《谈丛》	175
第六节 志怪类小说：《夜窗鬼谈》	177
第四章 话本体日本汉文小说	188
第一节 世情类小说：《和汉奇谈》与《本朝小说》	189
一、商人富贵平安：《和汉奇谈》	189
二、女子复仇传奇：《本朝小说》	197
第二节 艳情类小说：《春宵拆甲》与《春风帖》	208

第五章 章回体日本汉文小说	221
第一节 历史演义类小说:《太平记演义》、《海外异传》与 《西征快心编》	222
一、中世历史的演绎:《太平记演义》	224
二、政治理念的外化:《海外异传》	237
三、政治心态的小说化:《西征快心编》	242
第二节 才子佳人类小说:《新桥八景佳话》	247
第三节 神魔类小说:《警醒铁鞭》	257
第四节 英雄侠义类汉译小说集:《译准绮语》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78
【附录一】简明日本历史年表	287
【附录二】日本历代天皇年号表	302
后记	31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理路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评述

(一) 选题缘起

一般在文史研究领域里,新资料的发现历来是学术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这已成为共识。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又有一批新资料被逐渐发掘出来,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就是时下所谓的“域外汉籍”。据研究,域外汉籍主要指称三方面的典籍:一是古代域外人士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撰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古代典籍的域外抄本或刊本;三是流失于域外的中国古代典籍之抄本或刊本。其中,前两类是域外汉籍的主体^①。这里,对“域外”一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应作特别说明:在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在东亚地区扮演着文化宗主国的角色,以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给予周边国家或地区以巨大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界限较明确的文化区域,现通称之为“汉文化圈”,除中国外,它还主要包括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地^②。目

① 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参见《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第131页。

② 李时人教授对“东亚”概念作了辨证,认为“东亚”是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复合型概念,它主要包括现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汉字是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关联的主要媒介。参见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前,域外汉籍主要指韩国、日本与越南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典籍,内容包括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部类的汉文作品,本书为明确研究范围起见,径称之为“东亚汉籍”。在东亚汉籍中,文学作品为一大宗,而小说则又是这些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不妨总称之为“东亚汉文小说”,目前主要包括韩国汉文小说、日本汉文小说和越南汉文小说^①。因为这些小说皆为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作品,它们中间有些作品又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外比较文学、汉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有鉴于此,现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汉文学的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东亚汉文小说研究,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教授等,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授、郑阿财教授等,更是成为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主力军。出于同样的考虑,国内大陆学界也展开了对这些小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目前,针对韩国、日本和越南三地汉文小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当地国、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都投入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客观地说,前两方面的学者是主力军,而台湾学者用力尤勤,成绩斐然。可喜的是,现在大陆学者对这些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态势。

现在看来,在三地汉文小说中,日本汉文小说在数量上不及韩国、越南汉文小说丰厚,学界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较薄弱。据目前所知,最先关注它们的是日本本国学者,他们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且持续至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拓荒者当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他在1987—1988年间在日本天理大学讲学的时候,通过多种渠道钩稽得奈良、平安、江户、明治各个历史时期的汉文小说作品数十种;从1998年起,王三庆又与台湾中正大学庄雅州教授、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陈庆浩教授等人,共同主持了“中日法合作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计

^① 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首先关注了中国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宋莉华教授继之作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些小说也属于域外汉文小说之一部,但它们在创作文化背景、作者身份、文本面貌等方面还是与本书所谓的“东亚汉文小说”有较大差别。

划”，他们在日本筑波大学内山知也教授的协助下，又搜求得小说数十种，连同以前所获得的作品，共收得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近 70 种。之后数年，由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四位教授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于 2003 年 10 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这部丛书共五册，收录了《啜茗谈柄》等 36 部（篇）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考订、校注均达到了一定水平，富含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另外，王三庆等人又开列多种待收书目，并拟继续加强对作品的访求、整理和出版工作。在大陆学界，以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为代表，学者们也逐渐对三地汉文小说展开了整理和研究。例如，孙逊教授曾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李时人教授主持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影响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近年来，孙逊教授又依托上海师范大学，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与法国陈庆浩、台湾王三庆、陈益源、王国良诸教授联手，合作推出了包括东亚汉文小说和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在内的《海外汉文小说全集》出版计划，预计未来数年内将陆续结出硕果。自然，在上述两种旨在加强域外汉文小说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活动中，日本汉文小说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孙逊教授为代表的几名大陆学者通过单篇文章、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等形式，都对日本汉文小说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评述

日本学者对本国汉文小说的研究最早或可追溯到 1926 年小说家永井荷风的《柳北仙史の柳橋新誌につき》一文，文章对明治文人成岛柳北的汉文小说《柳桥新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介绍^①。1933 年，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发表论文《江戸時代に於ける支那小説流行の一斑》，他在文章中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江户时代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与影响，并在文末简要提及了江户名儒中岛棕隐的汉文艳情小说集《春风帖》，认为这本小说集的产生与中国艳情小说在日本

^① 原载《中央公论》1926 年 5 月号，今见于盐田良平所编《明治文学合集》（东京：筑摩书房 1969 年版）第四卷，第 395—398 页。

的流布有很大关系^①。1940年,著名学者石崎又造的《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出版,此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主要为明清小说)在近世日本的传播情况,以及日本文人受此影响而创作和文与汉文通俗文学作品的情形,其中多处涉及日本汉文小说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讨汉文小说的论文逐渐增多,这些文章主要出自德田武、前田爱、山敷和男等学者之手。此间,汉文艳情小说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研讨的热情,50至70年代,广田魔山人、森铤三、斋藤昌三分别对《大东闺语》、《春风帖》、《春窗拆甲》三部小说作了介绍和考证^②。德田武于1969、1970两年间连续发表了三篇研究“世说体”经典汉文小说《大东世语》的论文,对作者服部南郭撰写《大东世语》的缘起、《大东世语》与中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及明代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的关系、《大东世语》的本土文化特色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这三篇文章成为该领域的力作^③。从70年代开始,花柳风俗小说成为研究热点,较早且较典型的成果是浅川征一郎的论文《土居香國の風流著作〈鴨東新話〉》^④。其后,前田爱和山敷和男成为研究这类小说成绩最为突出者。前田氏较早的一篇相关论文为《寺門靜軒——無用之人の軌迹》,研讨了《江戸繁昌记》作

① 原载《书志学》昭和8年第一卷4号,今见于长泽规矩也《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版)第五卷,第131—147页。此前,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发表《安穴道人と其の周围》,研究了《春风帖》的作者中岛棕隐,该文被收入其《支那文艺论藪》(京都:弘文堂1927年版)。

② 广田魔山人《〈大东闺语〉杂考》、斋藤昌三《〈春窗拆甲〉の作者は誰》,载《近世庶民文化》第26号(东京:近世庶民文化研究所,1954年12月);广田魔山人《春风帖》,载《國文學解釋と鑑賞》第三十三卷9号(东京:至文堂,1968年6月);森铤三《好事儒者中岛棕隐》,收入《森铤三著作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71年版)第二卷。80年代,《大东闺语》、《春窗拆甲》又被收入吉田精一编辑的《新編秘められた文學》(东京:至文堂1983年版)。

③ 德田武《〈大東世語〉論——服部南郭における〈世説新語〉(その壹)》、《〈大東世語〉論——服部南郭における〈世説新語〉(その貳)》、《〈大東世語〉論——服部南郭の人間認識之美意識(その参)》,分别载《东洋文学研究》1969年第17期、《中国古典研究》1969年第16号和1970年第17号。此前有赖惟勤《巡礼角田久华的〈续近世丛话〉》,载《文学》1965年第三十三卷10号,后来又有内山知也《有关江戸时代、明治时代的汉文人物逸话集——世说系和丛谈系》,收入《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④ 浅川征一郎《土居香國の風流著作〈鴨東新話〉》,载《國文學解釋と鑑賞》第三十八卷7号(东京:至文堂1973年5月)。

者寺门静轩的生平。此后,他又有《艶史・傳奇の殘照》一文,对明治初期的汉文传奇体小说、章回体才子佳人小说与笔记体花柳风俗小说作了简洁精辟的论述。《板橋雜記と柳橋新誌》一文则首次论述了中国清代余怀《板桥杂记》对成岛柳北《柳桥新志》创作的影响^①。山敷和男在汉文小说研究方面堪称大手笔,他在70年代初发表《〈柳桥新志〉之无赖派性格》一文,之后,至90年代初,以几乎每年一篇的速度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目光集中于明治时期以服部抚松和三木爱花为主所创作的花柳风俗小说群,系列研究中贯穿着强烈的小说类型意识^②。此外,《柳桥新志》的作者成岛柳北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森铤三、助川德是和日野龙夫都有相关文章或专著问世^③。除上述之外,山敷和男、中野三敏、黑岛千代、内山知也、有泽晶子等学者还针对其他类型的汉文小说进行了研讨^④。

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汉文小说,近20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① 前田爱《寺門靜軒——無用之人の軌迹》,载《國語と國文學》1973年8月号;《艶史・傳奇の殘照》,参见諏訪春雄、日野龙夫主编《江戸文學と中國》(东京:《每日新闻》社昭和52年版),第166—182页;《板橋雜記と柳橋新誌》,参见《前田爱著作集》(东京:筑摩书房1989年版)第一卷,第498—499页。

② 山敷和男《〈柳桥新志〉之无赖派性格》、《明治初期汉文2〈东京新繁昌记〉之魅力》、《关于明治初期汉文3〈东京柳巷新史〉——其自序与〈小说神髓〉》、《明治初期汉文5〈东京新志〉中的抚松著名汉文——介绍与略评及〈小说神髓〉的关系》、《明治初期汉文6〈新编东京新繁昌记〉——附:〈东京新繁昌记〉未翻刻资料》、《明治初期汉文7〈东京新繁昌记〉后编之研究》、《关于明治初期汉文8〈东京银街小志〉——其中的世界与〈东京新繁昌记〉的影响》、《明治初期汉文9〈改正增补东京新繁昌记〉之研究(一)——附:与自笔稿本的比较》、《明治初期汉文10〈根津新繁昌记〉及其作者——〈东京新繁昌记〉的影响(二)》、《明治初期汉文11关于〈东都仙洞余谭〉(一)》、《〈东都仙洞绮话〉概观(一)》、《〈东都仙洞绮话〉概观(二)》、《〈东都仙洞绮话〉概观(三)》,分别载《中国古典研究》1973年第19号、1976年第21号、1977年第22号、1979年第24号、1980年第25号、1981年第26号、1982年第27号、1983年第28号、1984年第29号、1986年第31号、1988年第33号、1990年第35号、1992年第37号。

③ 森铤三《成岛柳北の人物》,载《文学》1971年10月第三十九卷;助川德是《成岛柳北》,载《國文學解釋と鑑賞》1979年8月第四十四卷;日野龙夫《成島柳北と大沼枕山》(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版)。

④ 山敷和男《明治初期汉文1〈华盛顿小传〉》、《三木爱花〈情天比翼缘〉及其演义译本:中村柳坞〈芳春佳话百花魁〉》,分别载《中国古典研究》1975年第20号、1999年第44号;中野三敏《汉文戏作之展开》,收入諏訪春雄、日野龙夫主编之《江戸文學と中國》(东京:《每日新闻》社昭和52年版);黑岛千代《石川鸿斋の〈夜窗鬼谈〉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收入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中国语文学系主编之《小说戏曲研究》(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五辑;内山知也《蓝泽南城之汉文小说》,载《斯文》1999年第107号;有泽晶子《试论〈近世佳人传〉所表述的时代精神》,收入《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台湾学者起步较早,王三庆教授在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均是开拓者,《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初稿》一文,不仅介绍了他经眼的作品,还探讨了中日交通史、日本汉学史与这类小说的密切关系,并从内容、文体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总体特征,此文对推动国内的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他又撰有《明治时期的汉文小说》、《日本汉文小说词汇用字之分析研究》,从具体层面作了进一步研究^①。其后,李进益教授撰写了以《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影响之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与明清小说作比较的角度,分别对日本汉文小说中的艳情类、才子佳人类、花柳风俗类、“虞初体”、话本体作品作了初步的较具系统的探讨,多有创获^②。此外,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针对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了研讨^③。在国内大陆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早在1982年,严绍璁教授就在《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一文中论及了日本汉文小说的问题,但真正以具体作品作为对象展开研究则始于孙逊教授的文章《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该文对小说作者和题材、文体等方面的特色作了详尽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可谓开风气之先^④。其后,孙虎堂、杨彬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汉文小说作出了宏观或微观的研讨^⑤。其实,20

① 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初稿》,参见《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1—27页;《明治时期的汉文小说》,参见《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编),第121—131页;《日本汉文小说词汇用字之分析研究》,参见《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1999年编),第1—61页。

② 李进益《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影响之研究》,1993年6月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另外,他又撰有《日本汉文小说的艺术特色》、《〈译准开口新语〉初探》,参见《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编),第112—120页、《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1999年编),第81—91页。

③ 王国良《中国笑话集在韩、日、越的流传与保存》,为“2004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此外,美国华裔学者钱南秀教授还针对“世说体”汉文仿作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文《〈大东世语〉与日本〈世说〉仿作》,载张伯伟主编之《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一辑。

④ 严绍璁《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载《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孙逊《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

⑤ 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为2006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其《日本汉文笑话集述略》、《日本唐话学者冈岛冠山及其汉文小说〈太平记演义〉述论》,分别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四辑、《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杨彬《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翻案”与日本古代小说创作方式的演进》,分别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年来,法国华裔学者陈庆浩教授、台湾学者陈益源教授、大陆学者孙逊教授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域外汉文化研究、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总论和访谈,对推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①。

总之,国内外学界针对包括日本汉文小说在内的东亚汉文小说展开研究的潮流方兴未艾,除了前文所述成果外,另有两项学术活动值得称道。其一,日本筑波大学内山知也教授在广泛搜求文献资料的同时,在东京号召成立“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会”,召集国内学人定期聚会研讨,旨在借此推动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在本国的开展。其二,台湾学人扮演了国内学界研讨域外汉文小说的排头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域外汉籍、域外汉文学与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了交流并扩大了影响^②。这些学术活动标志着东亚汉文小说研究正在稳健发展,也预示着其研究前景将更加广阔。

二、本书的研究理路

(一)“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名实辨证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在真正展开之前,首要问题便是明确研究对

① 陈庆浩《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刘倩《汉文化整体研究——陈庆浩访谈录》、段江丽《文化大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读——陈庆浩研究员访谈录》、陈益源《域外汉文小说在台湾》、孙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严明《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分别载《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② 自1986年9月起,《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连续召开了八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论文先后集结为七册(第七、八册合为一册)《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8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办“第九届中国古典文学会议”,会议将“域外汉文小说”列为会议专题之一,会后同类论文集结为《域外汉文小说论究》一书,于次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98年8月,东吴大学主办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研讨会”,与会论文集结为《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1999年6月,主办了“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结为《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2月,国立中正大学主办“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结为《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同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象。就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而言,此问题就是“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名实辨证问题。就字面说来,这个概念可表述为:日本境内现存用汉字书写的古代小说著作。自然,这个概念的所指实即日本境内现存所有小说类汉籍。依照学界对域外汉籍的一般共识,它应该包括三部分:古代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小说著作,中国古代小说的日本抄本或刊本,流失于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抄本或刊本。但目前学者们在操作层面上,无论是搜集、整理还是研讨,对象仅限于上述第一部分。因此不妨认定,“日本汉文小说”这一概念广义上指日本境内现存所有小说类汉籍,狭义上则指古代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小说著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后者。但即便如此,在后者中科学合理地小说类著作划定一个范围或制定钩稽这类著作的标准,仍然并非易事,这里需要对“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名实辨证进一步细化。

其一,作品的文字体式。日本上古时代无文字,故自汉字传入后,日本人不得不借用汉字作为书写的工具。后来,随着汉字及大量汉籍的传入,加之把诉诸听觉的语言转向诉诸视觉的文字的技术日益进步,日本人也逐渐发明出他们本民族的文字。但在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成熟的日本文字(片假名与平假名)最终完成创造之前,日本人书面著述之文字体式伴随其本民族文字的创造过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阶段。推古朝(593—628)的日本文字基本上使用的是汉字,但一些汉字已具有与其原义完全不同的和式的意义。书面著述的文字体式除了纯汉文体外,已出现运用汉字与借用汉字表音的万叶假名混合书写的体式,而且,有些汉文著述中的部分句子也已采用了与汉语句法全然相异的和式句法,即所谓“变体汉文”。事实上,就在飞鸟文化时代(593—672),日本文字发展到汉字、表意汉字和标音的万叶假名并存的阶段,而这三种文字体式也被应用到了书面著述中。后来,日本人在平安初期创造片假名,中期创造平假名,最终完成了本民族文字的创造。其书面著述的文字体式则主要有纯汉文体,纯和文体,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和汉混合体三种,而变体汉文在此期间只是偶尔少量残留于某些汉文著述中了。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文字体式的层面上,“日本汉文小说”应该是指纯汉文体或杂有极少量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而不应包括和汉混合体与

含有较多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例如,川合仲象的《本朝小说》(1799)中虽然零星杂有几处变体汉文,但总体上宜视作汉文体,是一篇“日本汉文小说”;而依田百川的《侠美人》(1891)则采用了和汉混合体的文字体式,故不当归入“日本汉文小说”的范畴。

其二,作品的文体性质。在古代日本人的汉文学作品,小说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若要从中将小说作品区分出来,就需依据一定的“小说”文体标准。但事实上,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内涵确定、统一的“小说”概念,种种“小说”概念大致有两个差异较大的学术史渊源:一个是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小说乃指史书之补充的“丛残小语”,指称一种特殊的叙事散文文类;一个是近代输入的欧洲文学理论,小说是散文体的叙事文学作品,它“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①。尽管现在有的学者倡导用后者的标准来规范古代小说研究,但它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并不能完全取代中国的传统标准。原因在于,假若以此来界定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归属,结果就会抹杀作为叙事文学作品之“小说”的历史(包括观念的与文体的)渊源。以此甄别作品,数量众多的“笔记体小说”在学术研究的坐标系中将无所适从,这也是在整理和研究日本汉文小说时必须明确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从文体角度鉴别一部汉文作品是否为小说、属于哪类小说时,既要参照欧洲文学理论中“小说”概念的标准,又须考虑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小说”概念的影响,还要兼顾日本本土的叙事文学传统。例如,淡水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779),主要记叙了中国唐代高僧鉴真的出身、经历、功勋等情况,更以精彩的笔触描绘了与其东渡日本相关的历险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但文体却为典型的长篇传记文,若就其传奇性而论,至多可以说它含有小说笔法,而本质上却非小说;又如大江匡房的《江谈抄》(约12世纪初),内容包含大量有关各类人物、寺院、乐器、诗文书籍、仪式惯例等的话题或故事,对后来《今昔物语集》、《古事谈》、《古今著闻集》等说话集的出现、物语文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5页“小说”条。

学的诞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后世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其文本形态却是问答形式的短文,基本上可看作语录体散文,而不应认作小说。

其三,作者的创作方式。考察现在所知道的日本汉文小说作品,可以发现日本人创作汉文小说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妨称为“原创型”与“翻译型”。原创型表现为作者通过独立构思并使用汉文撰写作品,而翻译型则表现为作者将和文小说汉译并把内容组织、统合于小说文体之中。目前学者们对前者的身份归属没有异议,但同一问题在后者身上则出现了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翻译型作品因为不具备原创性质,故不能视作日本汉文小说的一部分,而应归入“翻译小说”范畴。我们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其一,“日本汉文小说”乃是综合考量作者的国别、作品的文字体式与文体性质三方面特征归纳出来的概念,而“翻译小说”的概念性质则着眼于作者的创作方式和作品的文体性质两方面。可见,两者并非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概念范畴,使用它们判定一部汉文小说的身份归属时,两者不具有相对的关系,换句话说,两概念的外延存在着重叠的部分;其二,从章节的选择、情节的取舍与改造、文字的润色等各方面看,绝大多数翻译型汉文小说可看作是译者的一次再创作。故此,依照一种融通的研究观念,我们认为,一部汉文体翻译小说,只要其译者为古代日本人,即可被视作“日本汉文小说”,其与原创型汉文小说的区别仅在创作方式不同而已。否则,像冈岛冠山《太平记》(1719)、菊池纯《译准绮语》(1885)这样最优秀的作品将被摒除,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综上所述,本书所谓“日本汉文小说”是指日本境内现存汉籍中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撰写的小说作品,包括原创型和翻译型两大类。

(二) 日本汉文小说的分类

我们认为,目前对日本汉文小说进行一种初步、宏观的考察,可以采取两种模式,即纵向的小说史模式和横向的文体分类模式。因为有关这批小说的搜求、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所以采用小说史模式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研究规律,这样文体分类模式就显得比较合适了。重要的是,在分类时只有考虑到它们的实际生存语境,才能确立一种融通的小说文体分类标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综合考察